

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第二辑)

再度越海向台湾延伸,使闽台两
它以闽南方言和部分客家方言
式民间信仰、民族习惯、
新的文化风貌。尽管
与福建不同的遭
传统,表现
族本位的
形态的
同一

闽台 佛教亲缘

何绵山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第二辑）

闽台 佛教亲缘

何绵山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台佛教亲缘／何绵山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5

(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第2辑)

ISBN 978-7-211-06142-6

I. 闽… II. 何… III. ①佛教史—研究—福建省
②佛教史—研究—台湾省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7367 号

闽台佛教亲缘

MINTAI FUJIAO QINYUAN

著 者：何绵山

责任编辑：汤伏祥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211@fjpph.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人民日报社福州印务中心

地 址：福州鼓屏路 33 号

邮政编码：350011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13

字 数：289 千字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6142-6

定 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前言

台湾问题是萦系在海内外所有中华民族子孙心里的一个最牵动民族感情的问题。一个多世纪来，台湾无论沦入日本殖民统治，还是处在两岸对峙的政治纠葛之中，都是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存在着，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压力下，都不能把它和祖国分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同胞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小民；台湾社会和祖国大陆社会一样，都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建构和发展的。共同的文化，是一股潜在的、巨大的力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维系台湾与祖国密不可分的精神支柱。这一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中国人的纽带，也是实现祖国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

台湾与祖国的文化亲缘关系，最先、最直接的就体现为台湾与福建的关系。这是历史发展决定的。福建和台湾，都是以中原南徙的移民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稍有不同的是，在福建，中原移民南徙入闽，至宋代已基本完成；而在台湾，则是自明末清初开始，才由南徙入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再度大规模迁入台湾的。其文化的传播，也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发展，再度播入台湾。因此，闽台社会都先后经历了一个共同的内地化、文治化，实质也就是中原化的过程。虽然在台湾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源自中原的闽文化经历了其在台湾本土的不同发展，但未能改变其源自中原的本质。闽台被视为一个共同

文化区，皆因其文化有着历史形成的密切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简言之，就是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追索闽台文化的来路，也必然寻根到中华文化的源头。作为闽籍的文化学者，我们无论在进行福建文化研究，还是在探视台湾文化的发展，都为闽台文化共同源于中华文化而又呈现出多样形态的魅力所感动，也深感有责任揭示闽台文化这种同根共源的密切亲缘关系，以便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推动两岸民众的认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

为此，我们编辑了这套“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

丛书既名“闽台文化关系研究”，顾名思义，是以“文化”为讨论对象，以“关系”为切入点，在闽台的背后，涵盖的其实是两岸，所涉及的也不单纯只是文化问题。它是以闽台为中心，以文化为重点，来论析两岸关系的一套系列著作。

“丛书”第一辑（十一种）出版之后，受到海内外各方面关心两岸问题的学者、读者的欢迎。由于种种原因，最初设想的某些选题，未能如期完成，有些选题，也一时未找到合适的撰写者，使第一辑丛书留下某些欠缺和遗憾。有鉴于此，2005年成立的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中心和海峡文化研究会，甫一诞生，便接过这项工程，着手组织省内相关学者，进行第二辑九个选题的撰写。希望两辑共二十个选题的这套丛书，能较全面、深入地反映以闽台为中心的两岸文化关系，为建设和谐海峡，贡献一分绵薄之力。

目 录

第一章	1895 年前闽台佛教的发展	1
第一节	福建佛教的发展	1
第二节	福建佛教的特点	10
第三节	福建佛教传入台湾	41
第二章	1895 年~1945 年的闽台佛教关系	76
第一节	福州鼓山涌泉寺与台湾佛教的渊源	76
第二节	福州鼓山涌泉寺与台湾五大法派的崛起 ...	88
第三节	厦门与台湾佛教的互动	151
第四节	福建僧人应邀赴台湾讲经弘法	164
第三章	战后至今的闽台佛教关系	201
第一节	战后在台闽僧对台湾佛教的贡献	201
第二节	福建佛教与台湾四大道场的崛起	272
第三节	台湾“解严”后闽台两地佛教交流	319
第四章	闽台佛教的文化交流	357
第一节	闽台佛寺建筑	357
第二节	闽台佛教艺术	392
主要参考书目		406
后 记		411

第一章 1895 年前闽台佛教的发展

第一节 福建佛教的发展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中原一带，但在西晋之际，佛教就传入闽地。据《八闽通志》记载，侯官县于西晋太康元年（280 年）就有药山寺。这是见诸文字记载的福建第一座寺院。西晋太康九年（288 年），南安九日山建造了延福寺，为福建省第二座佛寺。南北朝时期，福建佛教有进一步的发展。宋昇明至南齐永明（477—493 年）的 10 多年间，福建建有 5 寺，即侯官明空寺、妙果寺，长溪（今霞浦）建善寺、延福寺，松溪资福寺等，此时佛教已由闽中向闽北、闽东传播。梁武帝时全省共建佛寺 28 处，并开始建塔，福建尼庵的建立也由此开始，闽县（今属福州）的法林尼寺，建于梁大通元年（527 年），正如《三山志·寺观》记载：“闽中尼寺自此始。”陈朝时福建建寺 30 座。陈永定二年（558 年），莆田郑生创建了广化寺前身金仙院。同年，印度僧人拘那罗陀到泉州，挂锡延福寺 3 年，翻译佛经，由此拉开福建译经的序幕。

隋代福建共建寺 12 座，佛教继续在闽东、闽北、闽南传播。隋初，陈后主之子镜台到永春避难。隋开皇九年（589 年），莆田金仙院升寺，由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无际禅师任寺主，他数十年如一日持修《法华经》，大弘天台祖业，剃度僧徒百人，授三归弟子万众，是传天台宗的一代名僧。

唐代福建佛教开始有较大的发展，全省新增寺院 735 座，但发展不平衡。主要在闽中、闽东、闽北，闽南也趋于兴盛。唐代传入福建的佛教有多种渠道，如仅三明地区就有远方僧人到此隐居修行而进行传播，从江西各寺庙传入，由广东经汀州传入等，因此既有整体性，又有独立性。唐代福建高僧辈出，如怀海、希运、灵祐、慧海等都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代福建名刹林立，一些在全国乃至东南亚享有盛名的寺院，大多建于这一时期，如建于唐建中四年（783 年）的福州鼓山涌泉寺、建于唐咸通八年（867 年）的福州怡山西禅寺、建于唐乾宁元年（894 年）的福州金鸡山地藏寺、建于唐咸通十一年（870 年）的闽侯雪峰崇圣寺、建于唐中和元年（881 年）的莆田囊山慈寿寺、建于唐长庆二年（822 年）的泉州开元寺、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的漳州丹霞山南山寺等。《三山志》卷三十三《寺观》称，当时造寺“殚穷土木，宪写宫省，极天下之侈矣”。可见这些寺院规模宏伟，富丽堂皇。

五代闽国，福建佛教独盛一时。其主要原因是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闽王王审知全力扶持佛教。光化三年（900 年），王审知在福州乾元寺开坛，度僧两千人。天复二年（902 年），他在福州开元寺建戒坛，度僧三千人。天祐三年（906 年），他在福州开元寺铸丈六高铜佛像一座、丈三尺高菩萨二座；越年，又设二十万人斋于开元寺，号曰“无遮”。同光元年（923 年），为庆祝后唐庄宗李存勖灭梁，王审知建太平寺，铸释迦弥勒像，又作金银字四藏经。王审知还特地命令浮海运木到泉州建造仁寿塔（西塔）。闽国王氏家族对佛教也极为热衷，王审知子王延钧于天成三年（928 年）在福州开元寺开坛，度僧二万人。后晋天福五年（940 年）七月，闽景宗王曦度僧万

人，连偏远的顺昌县亦有百余僧受度。王延彬在出任泉州刺史的16年中，优礼僧人，大造佛寺，对泉州佛教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王氏据闽时共新增寺院706座，连经济开发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孤岛厦门，也由僧清浩建造了第一座寺院泗洲院。其正如《鼓山志》卷七《艺文·碑序》所记：“闽佛刹千有余区，本其兴废，皆王氏织其协力奉教。”南宋人黄干在《勉斋集》卷三七中记道：“王氏入闽，崇奉释氏尤甚，故闽中塔庙之盛甲于天下。”当时福建僧人猛增，据《三山志》载，仅福州一府的僧尼就达六万多人，福州鼓山涌泉寺、怡山长庆寺、闽侯雪峰崇圣寺的僧人均多达一二千人。当时高僧云集。僧人地位空前提高，如雪峰义存常被迎进节度使府为僚属官将说法，官府斋僧建寺都谘请他决定。王氏在经济上对佛教也大力支持，如福州鼓山涌泉寺，据《鼓山志》卷五《田赋》载，王审知“所施膳僧之田多至八万四千亩”。统治者还以法定的方式，使寺院占有肥沃土地。当时一些贵族和富豪也带舍田入寺，据乾隆《泉州府志》卷二一《田赋》载：“是时膏腴田尽入寺观，民间及得其硗瘠者，如王延彬、陈洪进诸多舍田入寺。顾窃檀施之名，多推产米于寺，而以轻产遗子孙，故寺田产米比民业独重。”莆田、仙游两县许多大姓争施财产，造佛舍为香火院，多至五百多区。

宋代福建佛教愈加兴旺，其寺院之多为全国之冠。宋淳熙《三山志》卷四〇称福州“金银福地三千界，风月人居十万家”。《八闽通志》卷七五《寺观》称福建寺院“至于宋极矣！名胜地多为所占，紺宇琳宫，罗布郡邑”。仅福州府，庆历中（1041—1048年）有寺1625座；绍兴中（1131—1162年）有寺1523座。这些寺院不仅占好地，也建得富丽堂皇，如《三山志》卷三三《寺观》载：“祠

庐塔庙，雕绘藻饰。真侯王居”。宋人吴潜在《许国公奏议》卷二中叹云：“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据《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载，仅泉州，宋初“寺院之存者凡千百数”。连闽北建州，寺院也近一千座。其原因，正如《三山志》卷三三《寺观》所载，许多“富民翁姬，倾施赀产以立院宇者亡限”。寺院经济发达，占据许多良田，时人韩元吉在《南涧甲乙稿》卷一五《建宁开元禅戒坛记》称：“闽之八州，以一水分上下，其下四郡良田大山多在佛寺。”许多达官文人都喜欢在寺院中设立自己读书处，以便攻读之余和高僧谈古论今、吟诵作诗，如南宋名相李纲在绍兴元年（1131年）曾为邵武同乡宋禅师在泰宁建了寺庙而作《瑞光丹霞禅院记》。一些名人也以游寺为乐事，朱熹曾多次游寺，并多处题写对联。两宋时期福建僧尼之多，亦为全国之首。仅福州，据卫泾《后乐集》卷一九《福州劝农文》称：“农家之子去而从释氏者常半夫焉。”《三山志》卷四〇《土俗》载：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福州东禅院僧冲真在城东报国寺举行法会，“斋僧尼等至万余人，探闾分施衣、巾、扇、药之属”。至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止，这种每年一次的大型法会共举行了49次。连闽清小县，宋代最盛时亦有僧尼260人，宋理宗皇帝还为闽清白云寺御书“白云山”三字，以竖碑寺前。僧尼在闽南一带也发展速迅，《宋会要辑稿》第二百册《道释》载，“至道元年（995年）六月……是岁太宗阅泉州僧籍已度数万籍，未度者犹四千余”，使皇帝为之惊骇。据《泉州府志》记载，仅泉州市区，就有“僧侣六千”，以至朱熹为泉州开元寺写了一副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宋代福建僧人被朝廷赐号的为数不少，如赐号“真觉禅师”的省澄、赐号“慧日禅师”的文矩、赐号

“法慧大师”的行通、赐号“悟空大师”的清豁、赐号“法济大师”的道岑、赐号“文慧大师”的法周、赐号“真觉道者”的志添、赐号“昭应广惠慈济善利大师”的普足、赐号“昭觉大师”的子琦、赐号“灵应大师”的道询等。据《宋会要辑稿》第二百册《道释》记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全国“僧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九人”，福建僧尼为“七万一千八十人”。

元朝，统治者热衷于念经、祈祷、印经、斋僧等各类佛事活动，并大建塔寺以修功德。所以福建元初虽经战乱而毁废了不少寺院，但不久又开始发展。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僧澄鉴重兴毁于战乱的宁德支提山华藏寺，历时十五载告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平章政事亦黑迷失率军远征爪哇，因无功而还，受到杖责和没其家资三分之一的处分。亦黑迷失由此特发诚心，谨施净财，广宣佛典。延祐二年（1315年），释觉琳在建阳县后山报恩寺万寿堂雕印《毗卢大藏经》，亦黑迷失全力支持并亲任劝缘主。翌年，他刻立《一百大寺看经记》碑，指定全国一百座大寺，据《福建通志》第四五册载，“各施中统钞一百锭，年收息钞，轮月看转‘三乘圣教’一藏”，并将租田二千石，散施泉州、兴化各处寺院，以作看转藏经之资。亦黑迷失指定的一百座寺中，福建占了32座，其中泉州有17座，故《金氏族谱》附录《丽史》称泉州为“僧半城”。泉州开元寺在元代有上千僧人，昌盛一时。《泉州开元寺志》称：“历五代而至宋，旁创支院一百廿区，支离而不相属。至元乙酉（1285年），僧录刘鉴义白于福建省平章伯颜，奏请合支院为一寺，赐额‘大开元万寿禅寺’。明年延僧玄恩主持，为第一世，禅风远播，衲子竞集。复得契祖继之，垂四十年，食常万指。”

元代福建名僧有谥号“广明通慧”的普济禅师，有赐号“佛心正悟大师”的契祖，赐号“佛果弘觉大师”的如照等。

明代，福建佛教再次兴旺。由于寺院占有大片良田，又拥有免除各种赋役的特权，所以不少民田被施与僧人。明人蔡清的《蔡文庄公集》卷一《民情四条答当路》载：“天下僧田之多，福建为最。举福建又以泉州为最，多者数千亩，少者不下数百。”仅建宁一府，就有一半的农田被寺院控制。洪武十五年（1382年），建宁已出现了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僧会司”，并已有寺庙一百多座。明神宗母亲慈圣皇太后，自号“九莲菩萨”，曾于万历元年（1573年）请宁德的支提山华藏寺大迁法师入京讲法，居住慈寿寺，八个月后还山。万历十八年（1590年），太后敕赐全藏678函和金冠、紫袈、黄杖、龙凤旗等物，三年之后，太后还传旨慰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太后谕以金铜合金铸造一尊重达千斤的毗卢遮那佛像送到支提山供奉；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神宗又命太监赵永奉送《藏经》进山。这种殊荣促使各地官员钦敬，大众膜拜。当时宁德地区不少文人学者，都成为在家子弟。支提寺的天思法师于万历年间被请到福州开元寺讲法，听众达千余人。这时宁德地区建寺已从沿海往山区发展，一些如寿宁、周宁、柘荣等僻远的山区建寺数量激增。明万历年间，福清黄檗山万福寺鉴源、镜源法师赴京请《藏经》，得叶向高宰相帮助，朝廷赐《藏经》678函，紫袈三袭，同时赐额，改名为“万福禅寺”。闽南一带佛教发展不太平衡，明嘉靖后，官府把寺院经济作为缓解“军储告匮”的主要渠道之一，甚至变卖寺产以充兵饷。一些豪强势族也伺机侵夺寺产，使一些寺院僧逃寺荒。如泉州开元寺、承天寺被军队占领，一度变成锻造兵器的场所。但闽南一

些寺院却依旧香火旺盛，《九仙临降谱》卷二记载，福州鼓山密宗派道盛和尚曾于明弘治年间，主持德化大白岩，授徒 18 人，自成“九仙派系”，其徒并分往尤溪、大田、安溪、永春、同安、龙溪、泉州、沙县等，又分布到全省 89 个寺、岩、庵、庙传教或住持。一些偏远的地区，佛教也不同程度地发展，如上杭的佛教活动颇兴盛，仅紫金山就先后建有中峰寺、五龙寺、麒麟殿等，僧人达 200 多人。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上杭开始设僧会司，理佛教事务。明末，由于福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一些文人不满意时政而归隐林泉，促使寺院发展。厦门岛上的文人学士与高僧隐士谈禅论佛，往来无间，有些人还积极参与拓建寺院，如万历年间（1573—1620 年），名士林懋时开拓虎溪岩，正德年间（1506—1521 年），觉光和尚大规模扩建普照寺，使厦门佛教初具规模。

清初，一些不满异族统治的人士遁入空门，但身入佛门而犹眷念故国，其中著名的如惠安的如幻。如幻本为明诸生，当清兵下剃发令时，出家于平山寺，以后卓锡于南安雪峰寺，成为闽南的一代高僧。据《雪峰如幻禅师瘦松集》之《黄檗隐老和尚衣钵塔记》载：福清黄檗寺的隐元，在明亡后，“登坛为衲子说戒，追念国恩，泪应声落，四众咸为饮泣”。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元贤，设法多方庇护明末遗民，并写下了“满朝袍笏迎新主，一领袈裟哭旧王”的沉痛诗句。郑成功据厦抗清时，东南沿海一批忠臣义士流寓厦门，他们或托迹山林，或削发出家，较著名的如阮文锡、姚翼明、杨秉机、林英等 30 多人，由此极大促进了寺岩的开拓和建设。清初的厦门寺岩，除虎溪岩和醉仙岩外，几乎所有的现存厦门寺岩，如万石岩、中岩、太平岩、云顶岩、宝山岩、碧泉岩、寿山岩、万寿岩、紫云岩、鸿山寺、金鸡亭、日光岩等都建于这一时期，厦门

佛教得以发展。清朝统治者笃信佛法，推崇佛教，民间集资修建新寺院甚为风行。福建的各大丛林，在清代均修缮过。清统治者对福建一些寺院多有赐额。如康熙十八年（1679 年），御赐福州芝山“开元寺”匾额；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敕赐福州鼓山涌泉寺御书“涌泉寺”匾额。清朝中叶因“倭患”和“迁界”，一些寺院被毁，泉州晋江建于唐宋间的古寺如法云寺、方广寺、崇真寺、普照寺、广教寺、安福寺、龙兴寺、报恩寺等都于当时被毁。但也有因地僻而相对平安，佛教得以发展。如正德版《顺昌县志》记载，明代顺昌寺庙被毁，仅存剩 18 座；到了清朝中叶，据乾隆版《顺昌县志》记载，康熙年间全县有名可查的寺院就有 30 座。据清康熙《沙县志》记载，康熙年间佛教有较大发展，旧时被毁废的寺院大都复建，全县总数不下百座。

福建佛教自唐五代后，虽然发展不平衡，但从全省范围上看，至近代持久不衰。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依附（东汉）、发展（魏晋南北朝）、鼎盛（隋唐）和衰微（宋代以降）的过程，但这种现象在福建没有出现，宋元以后，佛教在福建继续发展。其间虽然有元末战乱、明嘉靖后的倭寇骚扰和以寺院资产充军饷等因素的冲击，佛教局部受到打击，但总的还是有发展。据志书统计，福建唐、五代、宋、元、明、清新建寺院情况如下：

座 地 区	朝 代	唐	五代	宋	元	明	清	总数
福州		300	195	550	15	110	71	1241
厦门		3	1	1	2	3	7	17

续表

座 地 区	朝 代	唐	五代	宋	元	明	清	总数
宁德		108	95	244	2	54	40	543
南平		204	249	380	194	195	108	1330
莆田		19	11	59	29	23	13	154
泉州		27	47	78	38	30	10	230
漳州		16	8	27	15	12	11	89
龙岩		3	17	39	21	81	49	210
三明		55	83	115	88	74	73	488
总数		735	706	1493	404	582	382	4302

这些统计数字不一定精确，一些志书中记载不详的寺院尚未统计在内，但也可大致看出唐至清代福建佛教的发展。明清时，虽然闽南一带佛教发展缓慢，但在闽中、闽北仍然照常发展，在闽西甚至还较唐宋元有了更大的发展。

福建佛教长期兴盛不衰的原因，主要有六个方面：第一，统治者的扶持和倡导。从闽王王审知起，就对佛教予以种种优待，除了礼遇高僧，还拨了大量钱财修造寺院。历代统治者多次对福建各种寺院赐额，赠经书及赠送多种法物。宁德支提山华藏寺就是一例。第二，统治者的扶持推动了民间的崇佛风气。福建民间有捐款资助寺院的传统，不仅一般信士踊跃布施，一些地方官及告老返家官员也乐于舍钱。第三，福建寺院长期占有大量土地。寺院经济在福建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使福建寺院长期有经济来源。第四，外省许多高僧入闽。或为避战乱、或为弘法，外省许多高僧都来过福建。正如弘一大师所言，福建“法缘殊胜”。第五，东南亚许多庙院长期为福建寺庙提供资

助。福建许多寺院与东南亚关系密切，一些著名的寺院在东南亚都有分院。如福州西禅寺在东南亚的分院有新加坡双林寺、马来西亚檳城双庆寺和越南的南普陀寺（又称舍利院）、二府庙和温陵会馆（又称观音寺）。闽侯雪峰崇圣寺在东南亚的分院有新加坡的清华寺、马来西亚怡保东莲小筑与心灯精舍。莆田南山广化寺在东南亚的分院有印尼的万隆协天宫、三宝垄大觉寺、苏门答腊喃旁大兴庙、井里汶巴杞安潮觉寺、雅加达丹基百达新广化寺、苏门答腊巴东西兴宫、檳城吉打广福空宫等。第六，福建远离全国政治中心，历史上一些全国性的反佛运动传到福建已成强弩之末。如唐代武宗排佛，但传到福建，已被打了折扣。许多僧人藏进深山，暂避其锋，等风声一过又重返寺院。

第二节 福建佛教的特点

一 长期兴盛持久不衰（以福州佛教为例）

汉传佛教在福建的兴盛程度，可称为全国第一。福建从古到今，佛教长盛不衰。因福州佛教对台湾影响最大。《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宗教篇》称：“台湾佛教本流是由福建鼓山及西禅二大寺传来，另一派是福清黄檗寺。”即指福州鼓山涌泉寺、福州怡山西禅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① 现仅以福州为例，对其兴盛程度作一描述。

（一）佛教传入福州的年代悠久。福州真正大规模开发是在唐以后，但据《八闽通志》记载，唐以前，福州就

^① 瞿海源编纂：《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宗教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年6月版，第79页。

建有寺院 50 多座，其中最早的如：侯官县的药山寺（晋太康元年，即 280 年），侯官县的灵塔寺（晋太康三年，即 282 年），怀安县的乾元寺（初名“绍因”，晋太康三年）。相对福建全境来说，福州的寺院是最早建立的。据王志远等专家学者考证，佛教传入中国应为公元前 2 年，这与福州建寺，也不过相隔二百多年的时间。可见佛教较早就传入了福州。

（二）佛教传入福州后发展迅速，寺院众多。《八闽通志》始修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 年）。据《八闽通志》所载，明成化前仅福州寺院就有 1100 多所。许多县城寺院密度大，如侯官县城西，密布有 60 多座寺院，西北有 70 多座寺院；怀安县西南有 21 座寺院，闽清县西有 40 多座寺院。唐会昌年间（841—846 年），武宗排斥佛教对福建其他各府影响远低于福州，因山高皇帝远，福建各府甚至还有不少在会昌期间盖的寺院。然而福州不但唐会昌年间没有盖新寺院，还遵旨废了许多寺院（如怀安县安国寺等均在这一时期废），由此可见当时福州已成为政治文化中心，朝廷的指令，往往最早鞭及福州。福州寺院至今仍在福建乃至全国占有重要地位。1983 年，国务院确定了福建 14 座寺院为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庙，其中属于福州的就有 6 座，如创建于唐建中四年（783 年）的福州鼓山涌泉寺，目前基本保持了明嘉靖年间的布局，有殿堂 25 个，占地 25 亩，其刻经历史悠久，至今还藏有佛经 2 万多册。唐咸通八年（867 年）重新修建的福州怡山西禅寺，目前有天王殿等大小建筑 36 座，加上放生池及寄园等处，占地 100 多亩，1987 年新建的 67 米高的报恩塔是目前全国最高的佛塔之一。唐乾宁元年（894 年）创建的福州金鸡山地藏寺，现有地藏殿等建筑十多座。五代后唐长兴二年（931 年）创建的林阳寺，目前有天王殿大小建